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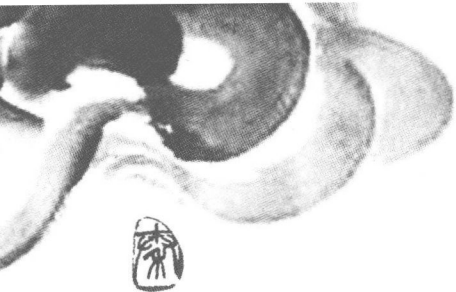
晚明

悲心歌

大明王朝灭亡之谜

陈梧桐◎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晚明悲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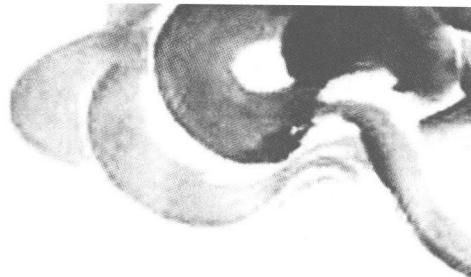
大明王朝灭亡之谜

目录 CONTENTS

引 言	/ 1
一、明神宗亲政后的倒行逆施	/ 5
清算冯保和张居正 / 5	
从短暂勤政到长期怠政 / 17	
勤于敛财，化国为家 / 28	
持续不断的派系之争 / 42	
城乡骚动，辽事渐紧 / 55	
二、从一月天子到短命皇帝	/ 67
纷乱的政局与短暂的“众正盈朝” / 67	
毒焰高涨的魏忠贤专政 / 78	
辽事日趋危急 / 98	
此起彼伏的民变与兵变 / 112	

晚明悲歌

大明王朝灭亡之谜



目录 CONTENTS

三、明思宗“中兴”之梦的破灭 / 121

期盼“中兴”，智除阉党 / 121

从惟才是举到重用宦官 / 134

反对植党而党争不断 / 147

一误再误，尽失关外之地 / 158

剿抚不定，魂断煤山 / 172

四、南明政权的相继覆亡 / 187

清兵入关与大顺军的败退 / 187

与虎谋皮的弘光政权 / 198

隆武政权与鲁监国的纷争及其抗清活动 / 212

永历朝廷的建立与南北各地的抗清斗争 / 224

大西军余部的联明抗清与永历朝廷的覆亡 / 237

结 语 / 251

后 记 / 257

引 言

这部《晚明悲歌》，写的是明朝后期即晚明的历史，但又不全面反映整个晚明的历史风貌，而是从政治史的角度，撷取若干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来展现繁荣强大的明王朝走向衰败的历史过程，探究其覆亡的深层原因，以供大家思考和借鉴，故名曰《晚明悲歌》。

代元而起的明朝，是中国古代史上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最后一个统一王朝，也是仅次于唐朝的第二个国祚绵长的封建王朝，统治时间长达277年。时当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一方面是传统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极度成熟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促使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发生了全面的变化，呈现出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新气象。明朝的历史因而具有鲜明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朝的历史，从社会发展进程及其总趋势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到正统七年（1442）王振专权，为明前期，是明朝的开创时期。明太祖创建大明王朝、登基称帝后，一面调兵遣将，将元朝皇帝逐出大都（今北京），赶往漠北，逐步实现了统一；一面大刀阔斧改革国家机构，强化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力倡程朱理学，革除元朝弊政，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使社会秩序渐趋稳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此后，雄才大略的明成祖朱棣将明太祖开创的基业积极加以拓展，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又力加守成，弼成“洪永熙宣盛

世”，奠定了当时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的强国地位。郑和下西洋，以其庞大的船队和先进的航海技术，将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半岛延伸到非洲东海岸，开辟亚非之间的交通网络，凸显了明朝在世界上的影响。明宣宗去世后，年幼的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宣德朝辅臣“三杨”继续辅政，保持了政局的稳定。

从正统七年（1442）王振专权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为明中期，是明朝的积弱与改革时期。这个时期，社会生产力继续快速发展，白银日趋货币化，农业生产日趋商业化，农民纷纷流入城镇从事商品生产，一批工商业城镇迅速崛起。私人海外贸易日趋兴盛，并迫使明廷在隆庆年间开放海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江南一些工商业城镇破土而出，经济结构内部开始出现缓慢而重大的变化。城镇居民逐渐兴起一股拜金逐利、奢侈享乐的风气，违礼越制的现象层出不穷，王阳明建构的心学体系，更对程朱理学发起挑战。至弘治、成化年间，明代社会已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在商品、货币的刺激下，大地主集团的胃口更加膨胀，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赋役征派日趋苛重。封建统治日渐黑暗腐朽，几代皇帝或纵情声色，或佞佛崇道，从而懈怠朝政，导致了宦官与权臣迭相专权，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从正统年间开始，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到嘉靖年间更形成鞑靼不时南下骚扰和倭寇不断入侵东南沿海的所谓“南倭北虏”交相困逼的局面，葡萄牙殖民者也乘机租居澳门。面对内忧外患，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在嘉靖初年和隆庆年间掀起了一股改革浪潮，至万历初年形成集大成的张居正改革，使统治危机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从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明神宗朱翊钧亲政到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明思宗朱由检吊死煤山（今北京景山）为明后期，是明朝的衰败时期。我们通常所说的晚明，指的就是这个时期。此时中国与世界开始连接，中国与西方直接发生接触。国内的商品货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继续缓慢地向前发展，全国性市场已初步形成，并向世界延伸，海外贸易迅速增长，大量白银滚滚流入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明显加快。逐利与奢侈之风更加盛行，违礼越制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由心学发展起来的泰州学派以及被称作“异端之尤”的李贽，更是高举反传统的旗帜，

倡导启蒙思想。作为心学的逆动，实学思潮也日趋勃兴。文学艺术加快了革新的步伐，市民文学日显兴盛，由西方传教士输入的近代科学知识，也为一些有识之士所吸纳。在明中期出现的社会转型迹象，此时已更加普遍、显著地呈现出来。然而，大地主集团却也更加贪婪和奢靡，疯狂地对广大农民和城镇居民进行压榨和掠夺，导致强烈的反抗。统治集团也更加腐朽。明神宗亲政不久便怠于政事，只顾聚敛财货、寻欢作乐；明光宗朱常洛沉缅酒色；明熹宗朱由校嗜好玩乐，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已难以维持，对社会的控制日渐松弛。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林立，争斗不休。建州女真乘机在东北崛起，建立后金（后改号为清）政权，荷兰、西班牙殖民者则侵占了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为了对付内忧外患，明朝统治者耗尽了国力，最后终于为农民大起义的浪潮所覆没。此后，明朝在南方的一批文臣武将相继建立几个南明政权。随着清军入关后全国民族矛盾的急剧激化，南明政权联合农民军余部，展开了长达20年的抗清斗争，但因内部矛盾重重，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未能挽救明朝灭亡的命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明朝的覆亡，明思宗实难辞其咎。但如果细加追究，人们又不难发现，导致明亡的祸根，早在明太祖废除丞相、强化君主专制之时即已深深埋下，而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统治危机的急剧加深，则出现在明神宗亲政之后，故有“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卷二一，《神宗纪》）之说。因此，本书便从明神宗亲政后的倒行逆施写起，来记述明朝覆亡的过程，探究其灭亡的原因。

一三一)要他抢先下手,扳倒冯保。两人经过一番密谋,决定先向冯保的亲信门客徐爵开火,再把火烧到冯保身上。十二月初七日,在他们的授意下,山东道御史江东之上疏,指责徐爵原是一名充军的逃犯,后投到冯保门下,混上锦衣卫同知的官职,“擅入禁庭,为谋叵测。应亟行窜逐,以清官府”(《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一)。还揭发吏部尚书梁梦龙,是以三万两银子,通过徐爵之手向冯保行贿,而谋得这个职位的。明神宗得奏,下令将徐爵逮入诏狱严加审讯,送刑部拟斩。后来,又勒令梁梦龙致仕。

十二月初八日,张四维的门生、江西道御史李植也上疏,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状,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大项。第一项是窃弄威福,僭夺皇权。引用徐爵日夜在值房批阅章奏,“凡重大之机务,紧密之军情,未经御览,未经阁票,而爵已先知,泄露于外矣”。恣意凌辱勋戚,僭用皇上黄帐。第二项是贪污受贿,聚敛钱财。每年由各方进贡入宫的珠玉珍宝约值十余万两,“保拣低者进用,而贵重者尽入私囊,赃罚库累年没逆臣家财奚止数百万两,保悉以假易真,而古器重宝窃为已有”。“私宅所藏,可当天下贡赋一年之入”。“第宅店房遍满京师,不能悉数”。建于原籍的私第,“规模之华峻,可拟王居”。第三项是“密迹辅座(张居正),掌握中枢(内阁)”(李植:《言事纪略》卷一,《题为奸险近臣久肆欺罔罪大恶极等事》)。

江东之、李植的上疏,其实是秉承明神宗的旨意行事的。史载:“初,张居正卒,上恶冯保。左右知之,以告御史江东之、李植。未敢即攻保,先论徐爵,果下狱论死,乃攻保。”因此,明神宗一接到李植的奏疏,就说:“吾待此疏久矣。”(谈迁:《国榷》卷七一)当天,他即下旨,将冯保降为奉御,发往南京闲住,冯保之弟冯佑等皆革职,发原籍为民。冯保在宫中的亲信,或贬为小火者,或永戍烟瘴地面。过了几天,又下令抄没冯保、徐爵等人的家产。虽然冯保等人早已将许多家产转移藏匿,加上查抄官员顺手牵羊,中饱私囊,但仍抄出大量珍宝财物。据户部奏报,抄没的冯保田产,变卖价银一万九千余两;工部也奏报,抄没的冯保邸宅,变卖价银六万九千余两(《万万邸抄》万历十一年癸未卷)。冯保原是李太后极其信任和倚重的心腹,但她对明神宗清算冯保之事却不闻不问。直到冯保被发往南京,她才问个“为什么”,明神宗回答说:“老奴为张居正所惑,无他故,行且召

还。”（《明史》卷三〇五，《冯保传》）她便不再过问。后来，冯保死在南京，葬于皇厂。

冯保既已受到严惩，他的一大罪状是“密迩辅座，掌握中枢”，张居正自然就难脱干系了。当年十二月十四日，善于窥伺的陕西道御史杨四知首先上疏，论劾张居正“贪滥僭窃，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等十四大罪状。明神宗立即在此疏上作出批示，指责张居正“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但念他“有十年辅助之功，今已歿，姑贷不究”（《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一）。同时，命令锦衣卫逮捕张居正的亲信庞清、冯昕、游七等人，送镇抚司严刑审讯，以图获取张居正的更多罪证。言官于是继续上疏，揭发攻击张居正，并要求将张居正倚重的官员罢黜法办，为张居正裁革的官员平反复职。明神宗随即下旨，罢斥大批张居正任用的官员，起复大批因反对张居正改革而遭裁革的官员。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又下诏追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等荣誉勋衔，并将其子锦衣卫指挥同知张简修革职为民。同年八月，再追夺张居正的文忠谥号。对张居正的弹劾和攻讦，随之急剧升温，迅速推向高潮。九月，云南道侍御史羊可立上疏，诬告“已故大学士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土，乞严行查勘”（《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一）。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已废辽王次妃王氏，也状告张居正“谋害亲王，强占钦赐祖寝，霸夺产业”，并特别强调，已废辽王“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万历邸抄》万历十二年甲申卷）。其实，辽王的被废，根本与张居正无关。第一代辽王朱植，是明太祖的第15个儿子，原封为卫王，后改封辽王，封藩广宁（今辽宁北镇），永乐年间移藩荆州（今属湖北）。几易春秋之后，至嘉靖十九年（1540）由第八代辽王朱宪焯嗣位。此人荒淫暴虐，隆庆二年（1568）以“淫虐僭拟”诸罪被明穆宗废为庶人，禁锢凤阳高墙即宗室监狱。辽王府也随之变成废宅。此事实系朱宪焯咎由自取，根本与张居正无涉，当时张居正仅是内阁的第四位辅臣，哪有决定藩王命运的权力？但是羊可立与辽王次妃王氏的奏疏，特别是王氏奏疏所说的辽王家财“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这句话，极大地激起了明神宗的贪欲。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他即命司礼监太监张诚、刑部侍郎丘橐，偕同左给事中杨王相、锦衣卫指挥曹应魁，前往荆州江陵查抄张居正的家产。

张诚、丘橐等人抵达江陵之前，先期令地方官吏封闭张居正老家宅门，登记户口，禁止出入探视。张家一些老弱妇孺躲进空室，未及退出。及至张诚等人赶到，开门查抄时，已活活饿死十几个人，有的尸骸已被饿狗撕咬吞食殆尽。张诚等人会同地方官吏锱铢必究，不日上报查抄结果，计抄得江陵张宅内黄金二千四百余两，银十万七千七百余两，银首饰一万余两，玉带十六条，另有一些未及清点的蟒衣、绸缎、纱罗、珍珠、玛瑙、宝石、玳瑁等。在查抄江陵张宅的同时，刑部也查抄北京的张宅，计得张居正在京房产等物折价银一万零六百两。两地查抄的张居正家产，合共“得黄金万两，白金（银）十余万两”（《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并没有传说的那么多。丘橐等查抄官员，又对张居正的家人严刑拷打，穷追硬索。张居正的长子、原任礼部主事张敬修，不胜刑虐，自缢而死。张居正的母亲年过七旬，眼看子孙相继而亡，自己衣食无着，整日以泪洗面。后经多人求情，明神宗才下令留下空宅一所，田地十顷，供其养老送终。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明神宗下令尽夺张居正官秩，收回以前赐予的玺书及四代诰命，将其罪状榜示天下，谓“当棺戮尸而姑免之”（《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其弟都指挥使张居易与次子编修张嗣修，俱发烟瘴之地充军。

万历后期曾入阁充任辅臣的于慎行说：“江陵之所以败，惟操弄（主上）之权，钤制太过耳。”（谈迁：《国榷》卷七一）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明初经明太祖的改革，更使军、政、司法、监察大权进一步集中到皇帝手中。后虽设内阁，但它毕竟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只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阁臣“只备论思顾问之职，原非宰相”（《明神宗实录》卷五〇一）。明穆宗死后，继位的明神宗年幼，无法亲操权柄，而按照明太祖钦定的祖制，太后又不能垂帘听政，作为权宜之计，李太后只得委政于首辅张居正，由他代行摄政。张居正也因此得以施展其政治抱负与才干，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但从国家的政治体制来说，他的所作所为毕竟是“上窃君上之威灵，下侵六曹之职掌”（《明神宗实录》卷五〇一）的。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是明太祖一手造成的，正如黄宗羲所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明夷待访录·置相》）明神宗年幼时，对张居正的独揽大权、严加监管，尚且可

以容忍。待到年龄增长，特别是大婚之后，他的权力意识逐渐觉醒，权力欲望日益膨胀，对张居正的威权震主，不再能够容忍，只是由于张居正仍然深得李太后的信任，而不便发作。待到张居正一死，他看到自己报复清算同样受到李太后倚重的冯保的行动，李太后并不干预，于是便放开手脚，对张居正进行无情的、彻底的清算了。张居正的悲剧，说到底，乃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

随着清算活动的展开，一股自上而下的取缔改革的逆流也汹涌而至。先后继任首辅的张四维和申时行，为了避专擅之名，以免招来灭顶之灾，便用所谓“宽大”之政来取代张居正的“束湿”之政（申时行：《赐闲堂集》卷二〇，《大学士张公四维神道碑》）。张四维继任后，即“务倾江陵以自见，尽反其所为”。张居正革除的冗官弊政，都一概恢复。申时行步其后尘，更建议明神宗废除考成法，弛驿递之禁。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不是被取消，就是仅存其形式而阉割其实质。于是，“纪纲陵迟，侵渔日恣，吏贪而民玩，将惰而兵骄，国储荡然”（谈迁：《国榷》卷七二），改革的成果尽付东流。万历新政至此宣告结束，明王朝开始步入了衰败时期。

从短暂勤政到长期怠政

明神宗并不是一个庸碌之辈。他幼颇聪慧，在母亲李贵妃的严格管教之下，注意学习，读过的书很快就能背诵。小小年纪，懂得不少为人处世的道理。六岁被立为太子，见父亲明穆宗驰马宫中，即上前劝阻，说：“陛下天下主，独骑而骋，宁无衔蹶忧？”（《明史》卷二〇，《神宗纪》）意思是说，你独自骑马飞驰，不怕马失前蹄，把你摔下来吗？明穆宗大喜，连忙下马，抱起他爱抚了一番。陈皇后无子多病，被明穆宗移居别宫，极感孤寂。明神宗每天早起洗漱后，就随生母李贵妃前去看望。陈皇后每每听到宫外的步履声，都兴奋异常，赶紧支着病体起床。见面之后，陈皇后就拿出经书来考问，他又总是对答如流，让她感到无限喜慰。两宫的关系因此日益融洽和睦，不存在其他后妃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仇怨和争斗。

明神宗继位后，在张居正的辅佐教育下，学习更加用功，“于宫中读

书，日夕有程，常二四遍复背，须精熟乃已”（《明神宗实录》卷四〇）。他还要求宫中的宫女、宦官，人人都要读书，形成一种学习气氛。对张居正主持的经筵、日讲，他认真听讲，而且能很快领悟。有一次，张居正进讲《帝鉴图说》，讲到宋仁宗不喜珠粉，明神宗即说：“国之所宝，在于贤臣，珠玉之类，宝之何益！”张居正因势利导，说道：“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故圣王宝之；金玉虽贵，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铢两之间为价不赀，徒费民财，不适于用。故《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良以此耳。”他便应声说：“然！”（《明神宗实录》卷一八）

就是上朝，幼小的明神宗也颇有模样，不仅认真审阅奏章，找出其中不应有的纰缪、失误，还能就一些重大问题做出决断处理。万历三年（1575）十月十九日视朝，他浏览北直隶暴孟奇、张宪翔等人去年十一月呈进的审决重囚的奏报，就叫文书拿去询问内阁大臣：现在北直隶的巡按已经换了人，为何奏本还是由暴孟奇、张宪翔署名？去年十一月进的奏本，又为何到现在才呈上来？过一会儿，张居正来了，解释说，去年派刑部主事刘体道会同关内外巡按御史暴孟奇、张宪翔处决囚犯，事情办完后，暴、张即写出奏本，交刘体道带回复命。但往时刑部有个惯例，下属出差办案，常常借便顺道回家探亲。后来刑部官员外出办案，一律给假一年，成为一种宿弊。这个奏本就是由刘体道携带回家，一年探亲期满，才返京呈进的。明神宗听了非常生气，第二天便下诏：“刘体道着都察院提问。”（《明神宗实录》卷四三）都察院遂将刘体道谪为外任官员。在视朝审读奉章时，明神宗发现有些言官抓住别人小的过失大肆弹劾，极为反感。万历元年（1573）二月春分，兵部尚书谭纶陪成国公朱希忠代祭朝日坛，由于偶患感冒，连声咳嗽。福建道御史景嵩、吏科给事中雒遵、山西道御史韩必显上疏弹劾他“大不敬”，不配当兵部尚书。明神宗阅后批示：“咳嗽小疾易愈，本兵（兵部尚书）难于得人。这所奏，着吏部看了，就问景嵩等要用何人，会同吏科推举来看。”吏部题复道：“纶选本兵，委难得人，进退大臣，当处以礼，若以一咳之故，敕令致仕，非唯不近人情，亦且有失国体。”他即批示：“咳嗽小失，何至去一大臣！这斯每（们）一经论劾，即百计搜求，阴唆党排，不胜不止。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明神宗实录》卷一〇）遂下令

将景、雒、韩各降三级，调外任；谭纶陪祀失仪，罚俸一月，照旧供职。

明神宗刚刚上朝的头两三年，还注意观察大臣上朝的人数和举止动态。他发现有的大臣并不把上朝当一回事，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松松垮垮，感到不能容忍。隆庆六年（1572）十二月初六日，他一上朝，就命人查点人数，发现有173名文武官员没到，立即传旨各罚俸禄三个月。第二年正月十九日上朝，纠仪御史报告，有119名官员失朝，再次下令各罚俸禄三个月。万历二年（1574）二月二十三日，他视朝时，又命纠仪御史查点人数，报告说有274名官员失朝，于是传旨各夺俸一个月。大臣见皇上如此认真，此后失朝的现象便明显减少了。

亲政之后，明神宗也颇有点励精图治的劲头。他自己说：“嗣服之初，盖亦无时豫怠。”（《明神宗实录》卷三一二）“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无负先帝付托。”（《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六）大臣也说：“皇上临御以来，日视朝讲，万几亲总，五夜夙兴，又且留心民瘼，加意人才，召对辅臣，咨访部院，开诚纳谏，虚己受言。”（《明神宗实录》卷三〇一）为了履行皇帝的职责，他还颇有些不辞劳苦的味道。如万历十三年（1585）四月十七日，因天旱不雨，明神宗由文武百官陪同，昧爽出大明门，步行至南郊求雨。礼毕，召见辅臣及九卿，说：“天时亢旱，虽由朕不德，亦因天下有司贪赃枉法，剥害小民，不肯爱养百姓，以致上干天和，今后还着该部慎加选用。”首辅申时行赶忙回答：“皇上为民祈祷，不惮勤劳，一念精诚，天心必然感格……臣等当即与该部商量申饬。”（《明神宗实录》卷一六〇）祈雨事毕，明神宗又坚持步行回宫。从皇城到南郊，往返将近二十里，这对平日惯于骑马乘轿的皇上来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明神宗亲政后，大权在握，力图改变过去凡事皆由张居正和李太后决断的形象，强调“事事由朕独断”。但由他决断的事却大多陷于失败而导致灾难性后果，唯独“万历三大征”获得成功，受到后人的肯定。所谓万历三大征，指的是在西北、东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并举的三次军事行动，即平定宁夏哱拜叛乱、援朝抗倭和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

我国北部的蒙古族，在明初分裂为瓦剌、鞑靼、兀良哈三大部。洪武年间，兀良哈部归附于明，明廷在其聚居地设朵颜三卫。永乐年间，经明成祖

的几次北征，瓦剌部和鞑靼部也先后归明，其首领分别被明廷敕封为王。明朝对归附的蒙古三大部，实行羁縻政策，蒙古内政完全自主。正统末年，瓦剌势力重新崛起，南下大举攻明，导致土木堡之变的发生。此后，瓦剌、鞑靼不时挥戈南下，成为明朝严重的边患。隆庆五年（1571），经高拱、张居正的努力，实现俺答封贡，明穆宗敕封鞑靼诸部中势力最强大的漠南蒙古首领俺答汗为顺义王，明蒙关系趋于缓和，边境相对安定。但是，在安定和平的年代，明廷也放松了北边的防御。万历十年（1582），俺答死去，其子扯力克继为顺义王，他对明廷逆顺不常，所部庄秃赖、失兔、火落赤等，多次进犯陕、甘、青一带。万历十八年（1590），扯力克以赴青海礼佛为名，率部东进，关中大震。明神宗急命右佥都御史郑洛为陕西、甘肃、山西等七镇经略，魏学曾为兵部尚书总督陕西、延（安）、宁（夏）、甘肃军务，负责西北防务。万历十九年（1591）二月，郑洛令宁夏巡抚党馨调兵去甘肃，党馨派遣游击土文秀西援。就在此时，发生了唃拜叛乱。

唃拜为蒙古鞑靼部人。嘉靖中期因得罪其部长，父兄被杀，投奔明朝边将。他屡立战功，升为参将、副总兵，遂私自招募兵马，组成一支苍头军。后因年迈致仕，由子唃承恩袭为指挥使。当党馨派土文秀率兵西援时，唃拜向郑洛自请与子唃承恩率所部3000人从征，得到批准。党馨对唃拜的自荐行为十分不满，处处加以刁难。唃拜率部至青海参加征战，后兵还宁夏。征战途中，他见明朝军政败坏，边防空虚，加上党馨正拟弹劾他冒领军粮之罪，遂生谋逆之心。此时，宁夏镇因冬季衣粮久拖未发，士卒怨望，唃拜等人乘机进行挑动，激其发动叛乱。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曾与唃拜歃血为盟的军锋刘东暘，率其同党杀死巡抚党馨和副使石继芳，逼总兵官张维忠自缢身亡。唃拜义子唃云和土文秀又杀游击梁琦和守备马承光。刘东暘自称总兵，唃承恩、许朝为副总兵，唃云、土文秀为左右参将，共奉唃拜为谋主。唃承恩率领叛军攻占玉泉营、中卫、广武等地，占领河西47堡，并拟渡河东向，与河套的蒙古部落会合，割据宁夏地区。总督魏学曾一面派兵沿河堵截，阻止叛军南渡，一面率部阻击套部骑兵，使之无法与叛军会合。明军逐渐收复河西47堡，逼使唃拜等龟缩于宁夏镇城（今宁夏银川）。

唃拜的叛乱，引起朝廷的震动。明廷从各地征调大批军队和火器，将宁

夏镇紧紧包围起来。但魏学曾督战无方，迟迟未能破城，转而向朝廷提出以招安代替征剿之议，遭到明神宗的否定。七月，他下令逮捕魏学曾，任命叶梦熊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叶梦熊坐镇灵州（今宁夏灵武），下令决黄河水淹宁夏镇城，明军乘势攻入宁南城。哮承恩等退入大城，明军又施用离间计，促使叛乱集团内部自相残杀。九月，刘东旸杀死土文秀，哮承恩又杀许朝、刘东旸，大城随即落入明军之手。明军擒获哮承恩，哮拜畏罪自缢，阖家自焚。哮拜叛乱的平定，显示了明朝的国威，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沿边的蒙古各部再也不敢轻易入塞骚扰了。

我国古代泛称东邻日本为倭国。元末明初，日本处于南北朝时期，战乱不休。各地割据称雄的诸侯——守护大名，为了掠夺财富，往往组织武士、浪人和商人，结成武装集团，到中国沿海掳掠骚扰。这些日本海盗，被称为倭寇。永乐十四年（1416），明军在辽东望海碇战役一举歼灭入侵的倭寇2000余名，倭寇的骚扰沉寂了一段时间。从1467年（成化三年）起，日本进入长达百余年的战国时代，各地的大名又纷纷纠集武士、浪人和商人，组织武装团伙，到中国沿海抢劫财富，用以支付他们的战争费用。嘉靖年间，倭寇的骚扰达到高潮。后来，经戚继光、俞大猷率领中国军民的顽强抗击，侵扰我国东南沿海的倭寇被相继荡灭。不过，这种倭寇，还是非国家组织的小规模骚扰。到万历年间，中日两国之间便发生了激烈的正面对战。16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开始东来，葡萄牙人占领印度果阿，又强占马来半岛的满刺加（马六甲），打破了亚洲原有的格局。16世纪中叶以后，西班牙又登陆菲律宾宿务，进而占领马尼拉。与此相呼应，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基本统一全国之后，也实行对外扩张政策，企图攻占朝鲜，进而侵略中国，建立日本在亚洲的霸权。一场援朝抗倭的战争随即爆发。

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丰臣秀吉派遣水陆大军16万人，从釜山登陆，攻入朝鲜。当时朝鲜承平已久，国王李昫只顾享乐，疏于防备。日军长驱直入，连下汉城、开城、平壤。李昫逃奔义州，遣使向中国求援。明廷经过激烈的争论，明神宗决定出兵援朝。但兵部尚书石崇仅派游击史儒和总兵祖承训统兵3000余人入朝，因兵力太少，加上地理不熟，结果史儒战死，祖承训仅以身免。

败报传来，明神宗又下令任命兵部侍郎宋应昌为蓟、保、辽东等处备倭经略，辽东名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克期东征。当时李如松正在宁夏战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宋应昌要求兵部拨给钱粮，制造装备，却遭到御史郭实的弹劾，请求辞职。明神宗大怒，下旨谴责宋、郭二人。兵部催促宋应昌尽快出兵。十二月，李如松从宁夏赶到辽东，率兵入朝，连战皆捷，于次年正月克复平壤，旋克开城。但因轻信朝鲜人说日军已退出王京的传闻，冒险挺进，在距王京30里处遭到伏击，损失几百名士卒。李如松退守开城，并分兵焚烧日军在龙山储积的军粮。日军连战皆败，军粮被焚，又闹疾疫，士气低落。兵部尚书石星与经略宋应昌急于结束战争，却派人与日军谈判。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日军退保釜山，翌年大部分撤回了国内。

丰臣秀吉借停战重整军备。万历二十五年（1597）正月，又出动14万余水陆军，第二次进攻朝鲜。明神宗下令革去石星的官职，任命邢玠为兵部尚书出任总督，都御史杨镐为经略，麻贵为提督，再次率军援朝。起初日军以优势兵力攻破闲山、南原等处，朝鲜军民纷纷逃散。邢玠督师抵达平壤，进军王京。杨镐、麻贵于十二月进至庆州，攻取蔚山，围攻岛山。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日军救兵骤至，杨镐狼狈逃窜，明军损失几近两万人，只得退回王京。明神宗下令将杨镐撤职，以天津巡抚万世德代之。邢玠增募江南水师，征调的广兵、川兵、浙直兵也先后抵达朝鲜前线，逐渐改变被动的局面。十月，传来丰臣秀吉已在七月九日病死的消息，中朝两国军队发动进攻。日军军心动摇，纷纷下海逃窜。十一月，明军水军将领陈璘、邓子龙和朝鲜将领李舜臣督师，在东南露梁海面截击日军，日军溃败，扬帆尽去，邓子龙、李舜臣也战死海上。这场援朝抗倭战争，以中、朝的彻底胜利告终，从而加强了中、朝两国的友谊，同时也保障了我国东北边境的安全。

明朝沿袭并发展元朝的土司制度，在西南地区设置土司，利用当地少数民族土酋管辖属民。土司必须定期向朝廷进贡，服从征调，但世代相袭，内政完全自主，容易形成分裂割据势力。播州（今贵州遵义地区）宣慰使司就是由杨氏世袭的一个土司。杨氏的始祖在唐乾符年间，自山西太原出征南诏，封授武略将军，遂世守播州。隆庆五年（1571），杨应龙袭父职为播州

宣慰使，下辖五个长官司，实力雄厚。

杨应龙袭职后，数次应召，出兵帮助朝廷镇压周边的土司叛乱和少数民族的反抗，并进献大木，得到明廷的信任。他也因此骄横跋扈，滋生雄踞全蜀的野心，不仅鱼肉百姓，专杀树威，甚至藐视朝廷法纪，在居所僭饰龙凤，擅用阉宦，俨然是个土皇帝。播州地处四川南端，紧邻贵州。万历十五年（1587），杨应龙妻妾相争，他专宠其妾而杀其妻，妻叔与下属五个长官司致书贵州地方官，告发杨应龙谋反。万历十八年（1590），贵州巡抚叶梦熊疏论杨应龙诸劣迹，巡按陈效弹劾杨应龙二十四条大罪，请求调兵征剿。但四川巡按李化龙以松潘防守急需播州土兵为由，主张招抚。鉴于两省意见相左，万历十九年（1591）明神宗命两省抚按官员会审杨应龙。第二年十二月，杨应龙被逮到重庆，对簿公堂，论罪当斩。杨应龙表示愿以两万金赎罪，被御史张鹤鸣驳回。当时正值日军侵入朝鲜，杨应龙又称愿率兵5万出征自赎。明廷遂将其放回，不久因朝鲜局势缓和而未出征。稍后，王继光出任四川巡抚，拟继续审问杨应龙，杨应龙抗拒不出。王继光兵分三路进剿，却在娄山关一带吃了败仗。万历二十三年（1595），以兵部侍郎出任贵州总督的邢玠到达四川，施用恩威并施之策，迫使杨应龙接受招抚，并献出12名党徒。邢玠派官处理，将杨应龙革职，由其子杨朝栋暂代，并责其缴纳4万金以助采木。其次子杨可栋被押往重庆作为人质，12名党徒被处斩。但杨应龙事后不仅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更加怙恶不悛。不久，便借口次子死在重庆，未领回尸棺，拒不缴纳赎金，并不断出兵四出攻伐。明廷因忙于援朝战争，未对杨应龙采取更强硬的讨伐行动。

万历二十六年（1598）因援朝战争已经结束，明神宗命李化龙为湖广川贵总督，从各地征调军队，并令刘綎、陈璘等援朝诸将率部入川，负责进剿。万历二十八年（1600）二月，李化龙兵分八路，共30余万人，杀向播州。到六月初，播州全境被官军攻克，杨应龙自缢而亡，叛乱被彻底平定。万历三十一年（1603），明廷下令在播州改土归流，划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别隶属于四川、贵州二省。杨应龙叛乱的平定，播州的改土归流，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对推动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明神宗的勤政，犹如昙花般短暂，有益于国家社稷的重大决策